

# 投稿英文學術期刊： 為何與如何<sup>#</sup>

何明修\*

## 一、「為何」的問題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向我邀稿，希望我能夠與國內學術同行分享國際出版經驗，大概是一些關於如何撰稿、投稿、修改的技術性問題。這些「如何」(know-how) 的問題的確很重要，也是許多研究者所關心的。近年來，台灣學界跟著國際流行，吹起了一陣「稽查文化」(audit culture) 的風潮。一線學校想要擠進世界排名，二線學校則是以一線學校為標竿。在這種趨勢下，能不能有 SSCI 出版品，關係到個人是否能取得教職、拿到研究計畫案、升等或約聘審查是否能通過，以及所在的系所單位能否通過評鑑審查等。

在這一篇文章裡，筆者只談英文學術期刊的寫作問題。不過，在進入到「如何」的操作步驟之前，我想先簡單談一下「為何」(know-why) 的問題。

首先，英文學術寫作對我們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在於英文並不是我們用來組織社會生活的媒介。同樣是華人社會，新加坡與香港學者所面臨的情境就與我們極為不同；在他們的社會中，英文即是用來維持大部分公共事務的語言工具，因此，既然英文建構了社會現實，用英文來研究當地社會也就不需要進行事先的翻譯工作。新加坡與香港的學者不常用中文或其他非英文的語言來進行寫作，因為在那裡，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用英文來溝通、宣傳，儘管他們在私生活中仍是用自己的母語。

其次，正是由於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不同，英文不是官方語言，台灣的學者面臨了工作環境上的雙語情境 (bilingualism)。在從事課堂教學、向

<sup>#</sup> 感謝王宏仁、王金壽、張恒豪等教授的指正意見

\*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政府提供政策建議、與民間 NGO 合作、發表公共批判意見時，中文是我們所採用的語言。事實上，二十年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潮流已創造出豐碩的成果，在許多領域，中文著作已經成為台灣研究中最具權威的書目。相對於此，在二十年前若要了解台灣，我們需要參考外國人用英文寫的作品。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也會同意，要掌握最新的研究趨勢，與國外的相關領域學者互動，英文仍是必要的媒介。簡單地說，要扮演「公共知識份子」，要進行「公共社會學」，沒有辦法不透過中文；同樣地，沒有英文也不可能達到跨國交流的目的。無論這是不是國際學術邊陲的宿命，可以確定的是，雙語情境就是我們無法逃避的現實。

也由於本土化的努力，目前國內的學術期刊水準明顯提升，審查過程日趨嚴格。TSSCI 的出版品在各種升等、申請審查程序中也受到承認。根據我的閱讀經驗，大部分本土學刊文章都是很紮實的研究，使用很新穎的資料，也具有豐富的啟發性。即便如此，投稿英文學刊仍有下列的好處：

#### (1)「天寬地廣」

正如葉啟政（2003）、黃樹仁（2007）指出，台灣的學術社群規模太小，各種為了保障客觀審查的匿名機制（例如雙盲審查）並不能真正發揮作用。也由於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數目不足，一篇被退稿而重新投至其他刊物的文章，也會遇到相同的審查者。如此一來，無論是有意或無意，學術審查過程便容易滋生江湖恩怨。若干國外刊物即提供排除名單的選項；但就筆者所知，台灣沒有學術刊物鼓勵這種作法，而且，在我們「以和為貴」、避免公開衝突的文化裡，投稿者主動提出排除名單似乎也不是妥當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投稿英文刊物也許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這並不是說在英文世界不會發生「狹路遇仇人」的窘境，但是至少機率是小了許多。

#### (2) 回饋意見較具建設性

一般而言，國外刊物的主編權責比較大。這意味著，如果刊物的主編認為某份投稿文章有潛力，她／他不會只是扮演中立的守門員（gate-keeper），負責傳遞審查人的意見，反而會提供各種修改意見，試著幫忙讓文章能順利刊登。

#### (3)「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需要說明的是，TSSCI 的審查不見得比 SSCI 寬鬆，但是對於研究者而言，其實際報酬卻少了許多。無論這個事實是否很明白的被說出來，或學術

領導者是否願意公開承認，同樣的研究成品用英文發表就是比較有價值。或許用價格來說明比較清楚。以筆者服務過的兩個單位為例，在南華大學，一篇 SSCI 的獎勵是五萬元，而一篇 TSSCI 則是五千元；在中山大學，一篇 SSCI 文章可以拿到十二萬元的獎勵（如果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在所屬研究類別的前 30%），但中文的文章則完全不被採納。當然，如果學術研究的出版到後來只是爲了拿錢，這會是令人遺憾的。但獎助上的差別待遇，卻反映了目前我們學界評價的方式。

## 二、不同的讀者群、不同的期待

一般而言，英文學刊對於文章字數的要求比較嚴格，大部分的研究論文都規定在 8,000 字以內，有些可以容許到 12,000 字。國內中文刊物通常是以 20,000 字爲標準，但是有時爲了回應審查者的要求，一改再改，文章篇幅就會一直膨脹，筆者就曾出版過一篇超過 40,000 字的 TSSCI 研究論文。英文學刊對於字數的嚴格管控，是因爲他們期待好的文章應是開門見山，在開頭前幾段就將內容講清楚。

對於字數與寫作風格的期待不同，只是表面上的差異，事實上，投稿前應有這樣的認知：英文學刊與中文學刊面對著相異的讀者群，因此對於什麼構成了有價值的學術知識有著截然不同的標準。不可否認地，當我們提到國際學術標準時，其實我們所指的只是英美學術社群所持的觀點。對於著重於將在地經驗反思，並且從中提煉出學術理論知識的社會科學而言，脈絡的不同即意味著知識的判準是不相同的。然而，對於學術研究的核心地區而言，他們在地的脈絡就是普遍的，這是被視爲理所當然的，也鮮少被質疑的；但是對於邊陲地區而言，社會公眾、知識社群、學者所關切的問題，卻不一定爲核心地區學術界所接受。因此，簡單地說，撰寫英文文章之前，要先做好心理建設，我們得接受主流學界現行的觀點，以他們可能感到有興趣的問題意識出發，進而重新詮釋或是整理我們所收集到的經驗資料。我們當然也有可能找外國學者有興趣、台灣也關心的問題意識，只不過這種兩全其美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趙鼎新教授，就觀察到這樣的情況。他是因爲 1989 年的北京民主運動，才從生物學轉行至社會學。他當時就發現，美國社會學界所採用的理論視野與概念都是爲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所量身打造的，

但是要用來研究轉型中的中國，卻顯得困難重重，而且根本無法處理中國民運人士所關切的問題。因此，趙鼎新（2007：ix-x）得到這樣的看法：

「除非你能將所研究的某一中國的案例與西方的某一流行理論和問題意識連接起來，否則無論你經驗研究的好壞，西方的學者都很難對你的著作感到興趣，你也不會在西方學術圈內成功。相反地，一旦你按照西方理論和問題意識對一個中國案例作出分析，只要你夠聰明和刻苦，你就一定能在西方取得成功。問題是，中國問題的性質與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與西方學者的興趣與問題意識相去甚遠。」

他更不諱言地指出，許多獲得西方學界好評的中國研究，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很可能非常膚淺，只是「隔靴搔癢」。如果美國學界是這樣看待中國研究，那麼台灣學者的處境則更加弱勢，更沒有學術上的議價空間。因此，要投稿英文刊物之前，必需先思考這個問題：台灣的東西如何能引發不關心台灣的學者之興趣？我們對這個現實要有清楚認知，台灣畢竟是太不起眼的小國，再札實嚴謹的研究，也無法反駁既有的理論，或是建構新的理論。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無意去評論國際學術分工現象的問題，重點在於，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想要投稿英文學刊，則須採納他們的世界觀，用他人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社會。不可否認地，西方學術霸權是存在的，但是指責這種現象之前，我們也要問自己真的能夠免於「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考方式嗎？舉例而言，台灣的東南亞研究近十年來蓬勃發展，但試問，主流的中文社會科學期刊有可能接受一篇關於某東南亞國家，但不涉及華人或台商的研究論文嗎？事實上，研究興趣的選擇永遠關乎觀點取捨。根據國內東南亞研究博碩士論文分析指出，大部分的研究仍以台商或當地華人為主，比較少觸及其他的群體（林開忠、林坊玲 2008）。

因此，投稿英文學刊絕對不只是將既有的中文文章或是想法轉換成爲英文。研究者必須先問自己這個問題：如何將台灣的經驗賦予某種有意義的梳理或是包裝，使得不了解台灣的學者在讀完之後，也會有知識上的收穫？事實上，許多關於台灣的英文論文，包括那些刊登在頂尖學刊上的，並不是提出了我們在地人不知道的事情，其經驗資料也不是特別珍貴或難得，而是作者採用了一個可以與主流國際學術社群對話的觀點。

就台灣單一國家的資料而言，我們恐怕很難提出什麼大見解，但是仍有一些可以與國際主流學界進行有意義對話的方式。儘管區域研究（area

study) 在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定位一直遭受質疑，但是這個領域的刊物比較容許以在地脈絡來構思問題意識，因此較有可能接受更多元化的研究論文。其次，即使我們很難直接反駁主流的理論，但也許可以用台灣的例子來修正既有的模型。譬如，筆者在一篇 2007 年刊登於 *China Quarterly* 的文章中，就以台灣的國營企業來討論 Andrew Walder 所提出來的新傳統主義理論。新傳統主義是用來描述黨國體制下的中國工人；在台灣的脈絡中，我們也曾經歷過相似的黨國控制，但是這個體制卻是架構在族群分裂的社會現實之上。因此，我的文章便以族群的因素來修正這套新傳統主義的模型。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 Charles Tilly 教授曾稱這個方法是「加入一個新變項」(adding a new variable)，而這種局部性的修正，也許可以使台灣的個案獲得更廣大的理論意涵。

### 三、「如何」的問題

以上是討論基本的認識與定位，接下來筆者將討論操作層次的「如何」問題。重點分述如下：

#### (1) 選擇合適的刊物

理論上，在進行研究之前，或者是在撰寫草稿之前，可以先想好哪些期刊是可能的投稿目標；否則等到文章完成之後，再來尋找期刊是很辛苦的，而且還可能爲了因應其規定，而多花時間來進行潤飾的工作。

在 SSCI 的資料庫裡，有各式各樣的期刊，有些可能是平常就熟悉的，有些則是爲了投稿才去注意的。無論是熟悉或不熟悉，刊物的主編或是編輯委員會是首先要留意的項目，裡面是否有與自己研究議題相接近的學者，或是精通台灣、中國事務的專家，是相當重要的線索。一般而言，他們往往扮演第一道的守門員角色，如果他們對於文章的觀感不佳，送外審的機會就不高。

另一個重要的線索則是近幾年的過期出版品 (back issues)，這有助於我們掌握這個刊物主要的取向。在社會科學中，質化的與量化的、批判的與主流的等等分野有時是很顯著的，萬一自己的文章「誤入敵營」，恐怕生存的機會不會很高。再者，回顧過期出版品時，也要注意他們最近是否曾刊登相似主題的文章、或是否刊登過關於台灣的文章。如果是的話，這可能表示他們對於這些議題有興趣。更重要地，這些作者會受邀擔任審查人，來評論你所投

的文章。此外，在 SSCI 資料庫的計算公式中，被引用率 (citation rate) 也是很重要的項目。因此，有些主編也期待，刊登出來的文章能夠多引用自己出版的文章，這一點也需要納入考量。

## (2) 投稿的相關事宜

對於台灣的學者而言，在投稿之前，花時間潤飾英文是絕對必要的，甚至另外花錢找專業的編輯來修改，也是值得的。英語並不是我們的母語，即使我們的英文程度再好，也有可能寫出一些不太通順的句子。正確而流利的英文是稿件給人的第一印象；不可諱言，有些審查者讀完了前兩頁就有了定見，接下來的閱讀只是在找更多正當化的理由而已。

目前許多刊物都開始採取電子投稿，最早除了紙本以外，還要附寄磁碟片，後來則改為電子郵件。越到晚近，不少刊物更使用專門的電子網站，來處理投稿與審稿的工作。無論是那一種方式，投稿最好附上一封附信 (cover letter)，除了列上必要的聯絡方式，也可以順便告知若干訊息 (例如排除名單)。送出稿件之後，一定要注意是否有收到確認的訊息。如果稿件沒有直接被退稿，三個月是合理的等待期，超過這個時間，投稿者便可正當地詢問稿件的處理進度。

在與主編的往來過程中，電子郵件是很方便，但也是很危險的工具。信件有可能因為各種理由而憑空消失，進而影響文章審查的結果。此外，也有刊物的編輯人力明顯不夠，或是專業素質不足，甚至無法確認稿件寄達與否，也沒有辦法迅速告知處理結果，這些問題都需要格外注意。

## (3) 文章的修改

一般而言，如果拿到「修改後再審」(revise and resubmit) 的結果，無論審查者的意見再怎麼嚴苛，投稿者應該要覺得很欣慰。這表示文章已過了兩關，沒有被主編直接退稿，也沒有在外審階段就陣亡了，而且至少主編覺得這篇文章具有刊登的潛力。沒有人喜歡負面的評論，然而審查者的工作就是找出缺點。遇到很不客氣的評論，筆者的建議是，最好等到心平氣和之後，再開始著手修改。然而，修改的時間也不要拖太久，如果修改一直延宕，主編可能會因此而失去興趣。

在進行修改時，務必要注意主編的信件，其中有重點提示，標示出哪些是他所認同的評論意見。如果遇到完全無法接受的審查意見，有可能是由於不同的理論典範、政治立場，我的想法是盡可能不要與審查者爭論，原因在

於你不太可能說服對方改變想法。但是投稿者可以做的，也是一定要做的，即是註明這些段落，並且簡單說明自己的理由。最不好的處理方式是完全置之不理，不但不加以修改，也不在回覆意見中註明清楚。

無論修改的幅度為何，所有修改之處都得標明清楚，不要讓主編或審查者重新再讀一次稿件，花時間去比較不同版本的差異。此外，也要附上一封給主編的信件，列出所有的修改與回應。

稿件的生命週期很長，從接受刊登到實際出版，有可能曠日廢時，一位朋友就曾有長達三年的等待期。因此，如果遇到退稿，也不要感到萬念俱灰，應該要儘快找其他的刊物來投稿。退稿的審查意見書有其參考價值，如果有些明顯而重大的缺失，應該要立即改正，至少避免下一次的審查者也拿同樣的問題來質疑。基本上，被退稿是常見的事，千萬要用平常心來看待。

寫到這裡，筆者也需要自我打氣，最近才有一篇文章連續被五份學刊退稿。但是我相信，只要持續努力投稿，並且願意著手進行大幅度的修改，最後一定會有被接受的機會。事實上，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著作，也有被多次拒絕的經驗，只不過，到了後來，沒有人記得那段不堪回首的陳年往事。借用一句美國總統歐巴馬就職演講的話，遇到退稿，我們應該「重新振作、揮去灰塵、開始改寫文章的工作（pick ourselves on, dust ourselves off, and begin again the work of remaking our paper）」。

#### 四、結語

在 2006 年的台灣社會學年會上，有一場圓桌會議的主題是關於「健康、快樂的期刊評審過程」。在 2005 年的美國政治學會（APSA）年會，也有一場相似的座談會。這些節目的安排者的確很用心，他們希望有更多的學界同事了解一般的遊戲規則，避免無謂的困擾。的確，學界的互動準則應該要公開，而不只是一小撮局內人所獨享的知識。但是，即便再如何透明化的程序，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投稿與審查的過程本身仍舊是充滿壓力與挫敗，換言之，是「很不健康，也不快樂」的過程。但我相信，即使是那些目前被視為大師的社會科學家，他們也一定經歷了各種大大小小的被退稿、或是要求修改的考驗。

對於企圖在英文世界發表的台灣學者而言，這樣的考驗是更沈重的，因為除了各種「如何」的操作問題之外，還有各種「為何」等知識論層次的

問題。要在英文學刊上刊登文章，不只要學會他們所使用的學術語言，更需要學會另類的觀點，試著以他者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社會。Zygmunt Bauman 曾指出，社會學的訓練並不是在於啓示我們某種永恆的真理，而是使我們欣賞、理解，並且學會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種說法很符合台灣社會科學家的處境，畢竟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搞本土化，也不太可能全盤接受西方的問題意識。換言之，學術上的雙語情境是必然面對的現象，我們既然選擇了這條道路，也得面對它所帶來的考驗。

### 參考書目

- 林開忠、林坊玲（2008）〈台灣的東南亞研究碩博士論文：現象與分析〉。《亞太研究論壇》41：66-76。
- 趙鼎新（2007）《社會運動和革命：理論更新與中國經驗》。台北：巨流。
- 葉啓政（2003）〈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5：1-34。
- 黃樹仁（2007）〈小國的學術困境：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117-180。